



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

孙江 主编

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

(一八三三—一八九八)

潘光哲 著

本书出以阅读史的研究取向，预期比较细腻深入地描摹「西学」在历史本来场景的诸多面向。笔者造拟譬喻之说，认为当晚清世变日显之际，士人一旦有心知晚世事，启动追求「世界知识」的举动，步入与「西学」相关的最新读书天地，就像迈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「知识仓库」。漫步于「知识仓库」钻研「西学」的士人，可以汲取的知识观念，实在多种多样斑斓。

凤凰出版社



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

孙江 主编

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

(一八三三—一八九八)

潘光哲 著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：一八三三—一八九八 /
潘光哲著. — 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9.5
(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 / 孙江主编)
ISBN 978-7-5506-2942-4

I. ①晚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知识分子—阅读—历史
—研究—中国—1833-1898 IV. ①D691.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66316号

书 名	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(一八三三～一八九八)
著 者	潘光哲
责任编辑	张永堃
装帧设计	姜 嵩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bs.com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西路803号,邮编:214443
开 本	718×1005毫米 1/16
印 张	35.5
字 数	429千字
版 次	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06-2942-4
定 价	128.00元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0-86626799)



潘光哲，1965 年生于台北市。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。历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、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约聘研究助理、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、副研究员兼任档案馆主任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“外国人研究员”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、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、财团法人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董事长等职；现任“中研院”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。专业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与当代台湾史。另著有《华盛顿在中国：制作“国父”》《“天方夜谭”中研院：现代学术社群史话》等专书及学术论文八十余篇，并主编《（新版）殷海光全集》《容忍与自由：胡适思想精选》《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：纪念胡适先生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《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外交：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》等书。

封面题签／王汎森
责任编辑／张永堃
装帧设计／姜嵩

南京大学双一流基金项目

序 言

21 世纪新的一页已经翻开,20 世纪的课题旧态依然。“语言学转向”(linguistic turn)导致近代知识(modern knowledge)的自明性受到质疑;“连接性转向”(connective turn)——新媒体所带来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根本变化——促使论者反求诸己。如何认知和重构现代知识体系,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。

近代意义的“知识”一词源于古希腊语,原意为与人的主观意见相对应、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学问。在中世纪的欧洲,有关知识的讨论尽皆笼罩于神学之下。因此,17 世纪以来近代知识的发生和生产过程,便是其获得自由之身、摆脱从超自然角度去解释和叙述自然界一切现象的过程。欧洲由此发生了知识革命,大众的、实用的知识表显化之后,经由某种学术体制实现了合法化。相比之下,中国近代知识的发生来自两条不同的路径:一个是传统知识的再生产,传统知识中蕴含的近代性要素,是其得以实现近代转变的原因所在;另一个是西方近代知识的移植,即“他者”逐渐内化的过程,其中包括翻译、接受、变异等再生产环节。

其实,若将中国历史放在 16 世纪以降全球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,不难看到一个现代知识全球旅行和相互影响的现象——“宋学西迁”、“西学东渐”、“东学入中”。简言之,16 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

将中国知识传入欧洲后,影响了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对于中国的认识,此乃“宋学西迁”之结果;19 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形塑了近代中国人的自我/他者认识,开启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程,这是“西学东渐”的产物;而中日甲午战争后,中国知识分子大举东渡,移植日本西学知识(包括传入日本的来华西人传播的西学知识),又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进程,是谓“东学入中”的知识往还。

基于上述视野,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自成立以来,即致力于从“全球本土化”(glocalization)——全球视野、本土实践——角度推动近代知识变迁的研究。目前正在推进一项大型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,即“影响中国及东亚政治—社会的 100 个关键概念研究”,旨在梳理中国近代知识的谱系,前瞻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。这套《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》,即为部分前期工作的结晶。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,以及后面还将推出的更多成果,能为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。

是为序。

孙 江

自序

那是一九八五年寒假的事了。承蒙张如意、李素琼两位助教的介绍，甫是大学新生的我，有缘拜见正在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（以下简称近史所）工作的许雪姬教授，她热心地向我介绍了近史所的图书馆，又让我借阅了王健民教授的《中国共产党史稿》。这部书当时还是禁书，她愿意将自己的私藏借给后生小子，开其视界，毫无所畏/谓，今日回想，真是感谢与佩服她的热忱关怀与勇气。此后，常往那里跑的自己，总是麻烦管理借书事宜的苏树先生，即使是那些盖有“匪伪书刊，不得借阅”戳章的书，他也从无迟疑，有求必应。我又摸索到近史所图书发行室的所在，阮囊羞涩的大学生，就算可以廉价购置近史所的专刊史料，还是难能席卷而归，管理发行室的朱熊祥先生，居然同意让我暂欠书款。一句话，没有机缘与助力，在那个时代沉迷于书本的青年，绝对没有满足知识饥荒的可能。

找书是一回事，读书致知是一回事，共感相应更又是另一回事。最近拜读余英时先生为他的名著《历史与思想》二〇一四年新版写的“序”，略述书里那篇众方传颂的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》畅言中国传统里迫害知识人，轻鄙理性和知识的面向，居然触动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台湾学术文化界的政治神经，引发了犹然身受

思想言论桎梏的读者的共鸣。这才回想起,为什么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首度拜读是文,深感有种说不出的酣畅痛快的理由。即使那时我犹是毫无知识凭借的高中生,只因《联合》《中时》两大报系之广宣而震慑于余先生之盛名,不自量力追趋风雅,实对其间精义要旨,大多无从领略;钻研再三,方始粗识堂奥。逮至一九九二年起,承蒙张秀蓉教授等师长提携,个人有幸担任台大历史系兼任讲师,初执教鞭,即将是文列为指定阅读文献之一,愿和同学分享一己的体会,期望他们挣脱高中历史教育的束缚。我在课堂上口沫横飞,他们无动于衷;学期末要求同学挑选一篇阅读文章撰写心得报告,选择是文者,百中无一。在旧体制下曾经激发热烈回应的鸿文名篇,时过境迁,竟挑动不了后来读者的心弦。未曾生活于那等体制的少年的青春,不需要品尝苦涩艰辛的滋味。

时光流转,几近三十年,居然有幸由近史所出版一部以阅读史为主题的专刊;自身阅读求知的岁月记忆,顿时跃然心怀。史学工作者可以与青史故迹的对话空间,固是广袤无已,却不是和一己的生命经验,毫不相干;史学家的观照所及,引发的感触回响,更是难以预料。即便时代的思想气候变徙无常,史家严谨求证、心血汇聚的学术/知识成果,绝对经得起考验。《历史与思想》新版的堂皇问世,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?

研究书写以“西学”为中心的晚清阅读史,涉猎史料,安排架构,筹思表述之途,回想起自己的阅读史,便不能自己;问学研史,致知言理,不该仅是为了叩问自我的生命史,更在于怎么创生实质的历史知识,厚植深拓人类的知识板块与智慧空间。阅读史的研究取向,广被认知理解为新文化史之一脉。但是,新文化史挑战质疑既存的研究典范,开拓新的史学研究领域,终究不能专以建构理论、托诸概念等空言为能事,乃致逾越史学实践的学科纪律。意欲

超越既有历史叙述的主流架构，又能为认识理解人类的存在处境，别开新域，只有力求祛除既存意识形态与学术积累的障碍，立足于史料的确实追索考问，清楚疏理过往岁月的千端万绪，明白阐述其间蕴积的错综复杂，才是生产实质历史知识的通衢大道。本书的研究书写取向，与其说是宏扬实践新文化史的路数，不如说是透过实证的析论，愿以自身承继知晓的史学知识，建立更形深厚的基础；或可提醒学林同好，前行贤达的心血所成，固然必须敬礼尊重，然亦非圣经神谕，绝对真理。后继者如果停留在“漫笔洒遍天下胜景”的泼墨式层次，即令长篇累牍，图画鬼雄，不过是包装着学术外衣的资料堆积，对实质历史知识的增长，必然无所助益。然而，始生之物，其形必丑。晚清阅读史研究作为新兴领域，笔者所为，几无依傍，意欲开道辟蹊，举步实艰。若有高明学人，对此别呈新态，独显风华，必将空间无限。本书如可作为史林同好进一步开展研究的础石，那将是笔者最大的荣幸。

惟则，史料海渊，史学域广，却是步步陷阱，问津者自宜审慎。撷拾片语只言而大做文章，形式上言之成理；仔细推敲，立论基础不过好似沙滩建屋。笔者自期承继“朴学”遗风，不尚空言，无一论无来历，戒慎而为，以小见大，或可别显气象。书本的生产、制作与流通，何时、何地阅读书本，如何阅读取材与挪用、改写或抄袭，本即阅读史研究之进路要旨；只有确立时间坐标定点，透过细致的评比考察，疏理各家议论之同调与歧异，始得稍可确证知识传播与阅读思想历程的变化关系。为考辨史源，显现史料本来面目，重建逼近阅读历程的相关真相，笔者务期尽力而为，是以本书注释，不避繁琐。为此之业，琐碎短钉；相关论点之论证，冗长无趣，笔者即于注释部分进行论证，期可于正文做出比较清楚的表述论断。读者如果要了解笔者的述说依据，可以阅读注释；如无兴趣，亦不妨碍

阅读正文。史界前辈严耕望先生巨著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，蜚声学林，众所推崇；却未必人人皆可展卷而终。盖严先生为求史实，利用大量史籍，屡屡出以考证，易令读者疲累而掩卷。本书价值自不能与严著比肩，惟求法式其意。本书立论，屡屡有赖考证，“论从考出”，故列有附录十六篇，或断系年，或考史源，统置于书末，以醒眉目，并供参照。斯举所为，较诸时下风尚，大有不谐；得失高下，皆望高明指教。

本书的准备与写作，前后逾十年。期间若干内容已经发表，有劳史林前辈和多方博雅惠示高见；统整为专著，已经大幅增删、改写、修正，出处如下：

第1章《导论》：部分内容改写自《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：“知识仓库”、“思想资源”与“概念变迁”》（《新史学》卷16期3，2005年9月）；《开拓近代中国历史图象的新天地：“近代中国的阅读、出版与文化”专辑·导论》（《思与言》卷43期3，2005年9月）。

第2章《“知识仓库”的建立与读书世界的变化》：新撰写（“知识仓库”为个人营构多年之词汇）。

第3章《朱一新的读书世界与“地理想象”的知识基础》：改写自《西学冲激下的传统士人：朱一新的西学知识》（“中国近代知识转型学术研讨会”论文，2003年12月17日；本文未公开发表）。

第4章《“西学”的“新闻化”：〈时务报〉与它的读者》：第一节：新撰写；第二~三节：改写自《〈时务报〉和它的读者》（《历史研究》2005年第5期）；第四节：部分内容改写自《开创“世界知识”的公共空间：〈时务报〉译稿研究》（《史林》2006年第5期）。

第5章《“西学”的体制空间：以〈沅湘通艺录〉为中心》：改写自《科举体制下的“新学”传播空间：以〈沅湘通艺录〉为例》（“101：后科举时代的反思”学术研讨会论文，2006年12月21日；本文未公

开发表)。

第6章《“读书秩序”和“知识仓库”的活用转易》:第一~二节:新撰写;第三节:部分内容改写自《伯伦知理与梁启超:思想脉络的考察》(载李喜所主编: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》,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2005)。

第7章《结论》:新撰写。

惟以个人智弩力钝,时日拖延,长时间未能勒为完稿;值此网络文化发达不知伊于胡底之时代,竟引致若干论者袭取笔者之立论或表述,公开发表。故笔者于恰当段落之注脚,分别声明,有劳识者谅鉴,毋以为笔者抄袭彼者是幸。

本书的撰作工程,有赖于近史所的学术环境。进入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服务,安身立命,实是荣幸之至。个人亦尝荣膺哈佛燕京学社(Harvard-Yenching Institute)访问学者(2007~2008年度)与公益财团法人日本交流协会文化室之招聘(2013年度),得以分别沉潜从容于哈佛大学校园与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,广览史著,长我见闻,并此同致谢意。

书稿的撰成,首先必须感谢黄自进与黄克武教授的鞭策鼓励。工作期间,个人略有小恙,力难再兼行政工作,幸赖雷祥麟与山田辰雄教授慷慨助力,得以稍卸仔肩,细为调理涵养。长久以来的学思过程里,诸方师尊开我智窍,点拨教化,其中张忠栋、刘广京两位业师与朱维铮教授,已告仙去,讵咳永怀;阎沁恒、李永炽、张灏、林毓生诸夫子,师恩永铭;陈永发、吕芳上、林正弘、杜正胜、汪荣祖、狭间直树、瓦格纳(Rudolf G. Wagner)、陈慈玉、林满红、黄进兴、梁元生、洪长泰、王晴佳、沈松桥、钱永祥、陈弱水、张寿安、张力、张启雄、谢国兴、沙培德(Peter Zarrow)、康豹(Paul R. Katz)、刘季伦、薛化元、林富士、桑兵、罗志田、徐思彦、马忠文、章清、李细珠、

张仲民诸师友,或赐卓见,或代觅资料,惠我实多。陈力卫、水羽信男、孙江、刘建辉、陶德民、沈国威、陈继东、林少阳、村田雄二郎、石川禎浩、丸田孝志、松重充浩与吴炳守等先进师友,论学史林,其乐何如。初稿蒙陈建守先生与本所巫仁恕教授领导之出版组张珍琳、王中奇同仁之校读,纠谬攻错,谨此特致谢忱。一切谬失,仍应由笔者自行负责。王汎森教授惠赐墨宝题签本书书名,恩宠有加;内子杨桂果女士照料个人身心并设计封面,情深似海。

书成之时,家父潘蕴珠先生弃世四年矣。他老人家凭着淮北农民的土性与韧性,务本尽职,辛劳无已,拉拔了四个儿子的成长;对他们的生命抉择,始终支持。敬以本书为馨香一抹,永念父恩。

潘光哲 谨识

2014年7月22日

再版自序

这部《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(一八三三~一八九八)》于2014年9月由个人工作所在的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出版,列为专刊(99);翌年5月,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发行室通知笔者,初版800部即将售罄,是否拟修改再版。瞬即有此机缘,喜不自胜。然而,当时受限于体例要求,本书初版之内容,颇有删汰,非尽笔者原稿的样态;复且笔者揣想,学林评鹭所据,应仍为初版版本,拟俟静候诸方君子博雅月旦攻错之后,方始进行最后修正,故一仍其旧,重印面世。现今拙著除了得到“中山学术著作奖”(2015年度)之鼓励,复分别得到美国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、韩国仁荷大学车泰根教授与日本学习院大学小野泰教教授发表英、韩、日文书评;宋雪、徐佳贵和范广欣诸位青年才俊,也发表汉语书评;^①纠谬正误,惠我良多。2016年春,再蒙近代史研究所发行室通知,重印本又将

① 王晴佳(Q. Edward Wang)教授的英文书评发表于 *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*, 10: 4(2015), pp. 697-700;车泰根教授的韩文书评发表于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》辑66(首尔:2015年6月),页211-216;小野泰教教授的日文书评发表于《中国——社会と文化》号31(东京:2016年7月),页211-216(特别感谢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示知本项资讯);宋雪的书评发表于《汉学研究》卷33期2(台北:2015年6月),页275-280;徐佳贵的书评发表于《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期刊》期89(台北:2015年9月),页189-197;范广欣的书评发表于《政治思想史》2016期4(天津:2016年12月),页197-196。

售罄。凡此诸端,或可显示史林同道之厚爱。是则,笔者自应恢复拙著原貌,并据一切纠谬,进行修正,推出新版,以副学林厚望。现蒙南京大学孙江教授青睐,拟纳入《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》之一,复赖张永堃小友费心处理编务,以更臻理想的面貌奉献于史林,其幸何如。

相较于初版,现行本版之全书架构,大致相同;一己拙见之表述,稍有变异;并据诸方君子指教,修正误失所在。初版版本各章注释,统列于章末,有劳读者前后翻检,迭受批评,现乃统一移于各页之下。又以本书立论,颇有赖于考证之处,或断系年,或考史源,“论从考出”,初版列有附录十六篇,统置于书末;现改为二十五篇,仍置于书末。

本书以汉语世界的第一部阅读史专著为标榜,貌似史学“趋新”之作。较诸西方学林之阅读史研究,笔者本已声言,实无意“邯郸学步”,仅视之为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导向。就具体的书写实践而言,本书力求自显心得。如本书所论,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转变,有赖于现实的物质/经济条件,与书报的生产、流通与消费息息相关的“书本地理学”(geography of the book),绝对是士人阅读世界的构成要素。笔者思路之凭借所在,首先当然是必须指陈“书本地理学”一语的前驱者——法国学者 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 与 Henri-Jean Martin 之贡献,复据日本学者永岭重敏之考察,显示作为现代(摩登)都市的东京展现的独特“读书地理”风貌。吾辈固然当取“拿来主义”,广开知识视野;然而,具体研究时,万万不可奉理论为宗,墨守成规或依样画瓢,自当将外来理论/例证与本土材料“融会贯通”。本书取过往学界从不措意之湖南热心之士熊希龄等辈的“捐书书目”为例,具体论证,即便身处边邑的士人,遭遇“书本地理学”的难题,仍复出现有心之士愿为其打开知识窗口,各皆献

力而行的历史场景(本书第2章)。此等例证,不一而足;是否恰当,仍待博雅之士多所评鹭。

总言之,笔者假阅读史之取向而愿展示的图像,对于西学究竟如何东渐,期可善尽史家技艺之能事,细腻描摹其间样态,多元观照这段具体历史过程。毕竟,晚清士人求索西学,阅读致知的个体经验和思想回应,多象并呈,不该被后世的史学工作者一刀切平。就认识理解晚清中国的历史世界而论,若本书稍可扭转既存的历史成见,提供另一个思考的方向,笔者自感荣宠。有意涉足于斯域的史界同好,倘以本书为踏脚登高之础,瞻望环顾,继续开辟广阔无边的知识新疆,也必是笔者无限的荣幸。

潘光哲 谨识

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